

Asian Studies, pp.225~243.

Lee, Ching Kwan, 1998: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The Worlds of Factory Wome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14~35.

—— 1995: "Engendering the Worlds of Labor: Women Workers, Labor Markets, and Production Politics in the South China Economic Miracl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 (June): pp.378~397.

Pun Ngai, 1999: "Becoming Dagongmei (Working Girls):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in Reform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42 (July): 1~18.

—— forthcoming, "Opening a Minor Genre of Resistance in Reform China: Scream, Dream and Transgression in a Workplace," *Positions*.

Rozelle, S., Li, G, Shen, M, Hughart, A. and Giles, J., 1999: "Leaving China's Farm: Survey Results of New Paths and Remaining Hurdles to Rural Migration," *China Quarterly* 158 (June): pp.367~393.

Scharping, Thomas, & Schulze, Walter, 1997: "Labor and Income Development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 Migration Survey of Foshan and Shenzhen," in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Migration in China: The Impact of Economic Reforms*, ed. Thomas Scharping, (Hamburg: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ur Asienkunde, no. 284): pp.119~200;

Scott, James, 1986: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olinger, Dorothy J., 1999: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ant Migrants,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am, Siu-mi, 1993: "Chinese Regional Sentiment in Graffiti," *International Folklore Review* pp.973~980.

代际分层比较研究的 三代及以后的发展*

[美] 甘泽布姆、特莱曼、乌尔蒂

内容提要: 本文回顾了社会分层与流动国际比较研究这一研究领域在过去 40 年中的发展历程, 尤其侧重于该领域在近 15 年来的最新发展。正是在这 15 年中, 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研究经历了从第二代向第三代的过渡。这里对于分层研究不同“代”的划分主要根据对该领域产生深远影响的一系列核心研究项目以及与这些项目密切相关的数据搜集、测量方法、分析模型、研究问题界定、研究假设, 和主要研究结论等各方面的特点总结而出的。我们的讨论还涉及了一些在近些年逐渐成为研究焦点的新领域和新问题。在此基础上, 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在社会分层与流动国际比较研究从第二代向第三代演进的过程中, 在数据搜集和测量方法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在数据分析方法和统计模型建立方面

* 原载于《美国社会学年评》第 17 卷 (1991), pp.277~302. 译者宋时歌,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社会学系博士候选人, 宋理, 中国河南省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编辑。

发生的变化却很难说是否代表了该领域真正的进步；同时，在拓展研究问题和形成新理论方面，新的变化使分层流动国际比较研究的范围变得过于狭隘了。

一 引 言

社会经济优势地位的代际传递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针对这个研究问题的数据搜集出现于上一个世纪之交 (Perrin, 1904)。跨国家、跨年代的比较分析从一开始就在这个领域占据中心地位。要回答诸如社会优势地位传递是否依赖、如何依赖以及多么依赖社会组织结构的其他方面之类的研究问题，这种横向与纵向的比较分析是唯一可靠的手段。

社会分层和代际流动的研究通常可以被划分为三代 (Featherman et al., 1974)：第一代分层研究 (战后) 的特征是以使用简单统计方法来研究广泛的社会分层问题，职业流动只是当时众多研究主题之一。第二代分层研究将针对教育获得和职业地位获得的路径分析 (path models) 放到了主导地位；而第三代分层研究则以使用对数线性模型来研究职业流动为主。这三代分层研究最显著的区别在于：(a) 数据搜集方法；(b) 测量过程；(c) 数据分析方法；而在 (d) 研究问题的界定和 (e) 主要理论假设的提出这两个方面的发展则较为平缓。我们将从这 5 个主要方面入手来讨论三代分层研究的主要发展情况。

虽然我们清楚这三代分层研究并不是在所有 5 个方面都有不同之处，而且从时间上在代与代之间也没有非常清楚的界限，但是从学科发展的角度回顾这段历史并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项目来描述每一代分层研究仍然是一件很有

意义的事情。我们对第一代和第二代分层研究的讨论比较简略，因为其他学者对这些问题已经进行了很好的讨论 (Hazelrigg, 1974; Mayer, 1979; Matras, 1980; Featherman, 1981; Simkus, 1981; Campbell, 1983; Kerckhoff, 1984)。我们的侧重点在于第三代分层研究及其之后的发展。我们关于第三代分层研究的讨论部分地与柯尔茨和穆勒 (Kurz & Muller, 1987) 的讨论有相似之处，但我们得出的结论则与他们完全相反。

我们所要讨论的代际分层研究 (就是第一代分层研究所谓的“社会流动” [social mobility]) 包括对于地位代际传递的双变量分析和多变量分析；多变量分析的模型除了所研究的父与子的地位这两个核心变量之外，还包括其他一些影响代际分层流动的中介变量，例如教育获得 (educational attainment)。我们也加入了一些关于社会流动所产生的结果的讨论。我们的讨论排除了那些不包含直接的代际流动因素的研究，比如说收入分层和 (代内) 职业流动 (Kurz & Müller, 1987; Kallerberg, 1988)。我们的讨论不得不排除物质财富代际传递 (通过职业继承实现的例外) 的过程——并不是因为这一过程没有发生，而是因为这个话题在文献中鲜有提及 (Cheal, 1983)。

二 第一代研究

虽然索罗金的《社会流动》(1959 [1927]) 一书普遍被认为是现代社会学关于 (国际比较) 分层流动研究的起点 (Heath, 1981)，但是全国范围的、系统性的研究一直到二战结束之后才真正开始。格拉斯 (Glass, 1954) 根据 1949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调查数据撰写的专著是国际社会学学会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委员会 (Research Committee 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So-

ciological Association)成立的直接动因。该委员会从成立之日起就以促进科学交流、数据共享以及国际合作研究为其主要目标。在格拉斯的鼓励下,来自12个国家的学者在1950年决定在共同框架的指导下开展数据搜集的工作(Rokkan, 1951)。这个共同的框架包括在每个国家进行周期性的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调查,以探究社会分层的决定因素和对“阶级认定以及阶级对立”的影响(Svalastoga, 1959, p.22);在每个国家建立职业声望量表,并将其作为研究和测量代际关系的基础。这个计划在部分(但非全部)国家得到实现。比如说,斯瓦拉斯托加(Svalastoga, 1959)关于丹麦研究的著作就是基于他1953年完成的社会调查;日本(JSSRC, 1956, 1958)和荷兰(Van Tulder, 1962)分别在1955年和1954年进行了类似的调查计划。遵循格拉斯共同框架的研究著作有基于1954年波多黎各数据(Tumin & Feldman, 1961)和1954年瑞典数据(Carlsson, 1958)而完成的。真正能够体现第一代分层研究“国际比较”这一特性的则是李普塞与泽特尔伯特(Lipset & Zetterbert, 1956)、李普塞与本迪克斯(Lipset & Bendix, 1959),和米勒(Miller, 1960)等人的研究。李普塞与泽特尔伯特从10个国家的数据编制出一套14个3×3和2×2代际流动表(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table),他们的精力主要放在体力工作和非体力工作的对比上;米勒的分析包括了关于17个国家的20个不同大小的流动表以及对于较为详细的社会流动类型的研究(比如说精英的流动)。

带有第一代风格的分层研究一直延续到分层研究的主流已经从第一代转移到第二代之后。一些学者继续搜集已经发表的流动表并编纂成册,使用与李普塞、本迪克斯和米勒多少有些相似的方法进行分析。米勒搜集的流动表被其他学者加以扩展并重新分析(Marsh, 1963; Fox & Miller, 1965; Svalastoga, 1965; Lenski, 1966; Cutright, 1968; Jones, 1969; McClendon, 1980; Raftery, 1985)。

哈扎伊尔里格(Hzaerlrigg)从1960年之后的研究中汇集了一套新的职业流动表(Hzaerlrigg, 1974; Hzaerlrigg & Garnier, 1976)。泰里伊(Tyree)等人(1979)使用了上述的部分数据分析了24个2×2的流动表;格鲁斯基与豪瑟尔(Grusky & Hauser, 1984)分析了16个3×3的流动表。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最后两篇文章虽然使用了第一代分层研究部分数据和数据搜集方法,他们使用的数据分析方法却属于第三代分层研究所特有。

虽然第一代分层研究的共同框架中包括了用以确定职业地位的全国性职业声望调查方面的内容,但是后来大多数发表的流动表使用的却不是职业声望,而是各个研究者自己专门设计的一些非标准职业分类。这样一来,为了取得不同研究项目之间的可比性,只能将详细的原始职业分类归入三个高度概括性的类别:农业劳动,体力劳动和非体力劳动;在一些研究中甚至只有体力劳动和非体力劳动之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将职业类别重新分类并归入两、三个高度概括的大类的办法是在不同国家的职业流动表之间取得可比性的惟一办法。但是有时候甚至这种办法也无法取得满意的可比性;比如说,虽然英格兰和威尔士以及丹麦的流动表经常被用来演示新的流动模型,他们却无法被归入农业、体力劳动,以及非体力劳动这种分类框架中去,因而他们大多被排除在以后的国际比较研究之外。^①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第一代分层研究仅限于对(职业)流入和流出百分比(inflow and outflow percentages)进行简单比较(Lipset & Zetterberg, 1956; Miller, 1960)。尽管如此,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职业流动率(mobility rate)

^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Glass和Svalastoga在这些研究中使用了职业声望量表(正如最初的国际社会学协会所计划和设计的那样)而不是当时流行的非标准化职业分类。

很大程度上是不同(国家)职业边际分布的函数,因而不应该作为进行比较研究的工具。一些学者提出了如何将控制了职业边际分布之后的流动机会(mobility chances)从未加控制流动率中分离出来的方法。格拉斯(1954)、古德海默(Goldhamer)与罗高夫(Rogoff, 1979 [1953])以及卡尔森(Carlsson, 1958)先后独立地提出了后来广为人知的“流动比率(mobility ratio)”的概念;但是这一概念后来也被证明并没有能够完全将流动机会从边际分布的影响下彻底地剥离出来(Tyree 1973; Hauser 1978)。

对于第一代比较分层研究来说最基本的研究的问题是:不同国家之间的代际职业流动模式有什么差别以及这种差别的程度有多大?而所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中最广为人知的是李普塞与泽特伯尔特(Lipset & Zetterberg, 1956; Lipset & Bendix, 1959)所作的结论:“西方工业化国家(总体)的社会流动模式大体相同”。这一论断针对的主要是当时一种流行的观点:美国是一个新生国家,因而它应该比其他工业化国家表现出更多的代际职业流动。但是他们的结论没有经受住当时(Miller, 1960)以及后来的学者(Jones, 1969; Hazerlrigg, 1974)对数据进行重新分析的检验。

第一代分层研究的第二个重要假设是工业化社会要比非工业化社会有较高的流动率(Fox & Miller, 1965; Lenski, 1966, pp. 410~417)。福克斯(Fox)和米勒,兰斯基(Lenski),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们发现在经济发展指标和社会流动指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Marsh, 1963; Curtright, 1968; Hazerlrigg, 1974),但是他们的具体结论受到了古德索尔普(Goldthorpe, 1985)的质疑。

第一代分层学者关心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政治结构对代际分层的影响。福克斯和米勒(1965)声称他们发现了政治稳定程度与代际流动水平之间的关系。科尔诺尔(Cornnor, 1979)认为社会主义体制促进社会流动。通过对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流动率的研究,他的看法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实证支持。

有趣的是,虽然第一代分层研究还提出很多辅助性的研究问题,但学者们只对其中的两个进行了国际比较分析。其中之一是社会流动对投票行为的影响。李普塞和本迪克斯(1959)声称他们在对5个国家的对比研究中发现了有关“分层效应”的清楚证据。一些后来的研究也触及了这个问题(Barber, 1970; Abramson, 1973);但是从总体上讲,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逐渐从社会分层转移到了政治学,继而在这两个学科中都销声匿迹了。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不同国家的职业声望体系是否存在相似性。英格尔斯(Inkeles)和罗塞(Rossi, 1956)关于这个问题尝试性的答案后来得到特莱曼(Treiman, 1977)严格的验证:不同国家的职业声望体系确实是大体相同的。

许多其他的辅助性问题只是在一、两个国家提出而没有引起广泛的国际比较研究的注意,比如说:在多大程度上人们倾向于根据家庭背景“对称择偶”^①(assortative mating by social origins),在多大程度上根据教育程度“对称择偶”(Hall, 1954),社会流动对生育行为的影响(Berent, 1954),以及社会地位对生活方式的影响(Svalastoga et al., 1956; Svalastoga, 1959)。尽管许多研究者认识到教育获得在社会优势地位的代际传递过程起着关键的作用(Glass, 1954; Carlsson, 1958; Tumin & Feldman, 1961),但是局限于当时有限的统计技术,他们无法回答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总的代际流动中,有多少是通过教育的传递作用间接实现的?

^① 指的是具有相同或相似特征(种族、民族、宗教、社会地位等等)的社会成员之间通婚的倾向。

三 第二代研究

第二代分层研究的发端受到了来自三个方面创新的推动,而所有这些创新都与邓肯(O.D.Duncan)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首先,布劳(Blau)和邓肯关于美国社会的研究(OCG-I)树立了数据收集的新标准。他们在这个方面的创新是在职业编码时使用美国人口普查的三位数职业分类体系。这种新的编码方法使得建立于较为详细职业分类基础上的比较研究成为可能。其次,邓肯(1961)介绍了一种新的可用于连续性数据分析技术的职业地位量表,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社会经济指标”(SEI)。它通过计算各个职业群体全体成员的平均教育程度和收入来衡量这些不同职业的地位,这样一来就将个人主要的资源引入了社会分层的过程之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社会学界对间接效果(路径)模型的引入(Duncan & Hodge, 1963; Duncan, 1966b)导致了布劳和邓肯“地位获得模型”的成型;而这一模型使得衡量教育和家庭背景对于本人地位获得的相对重要性成为可能。由于该模型引入了被访人的第一个职业,这使得研究本人的职业流动和使用同批人分析方法(cohort analysis)来研究历史趋势成为可能。该模型很容易扩展到用来测量某人在职业生涯的不同时期的职业地位,并用以建立事业链模型(career chain model)(Blau & Duncan, 1967, p.184; Featherman, 1971, 1973; Kelley, 1973a, b)。

与格拉斯的情形不同,邓肯的研究从来没有被明确地采纳为国际社会学协会社会分层研究委员会的研究方案。但是学者们对邓肯成果的反应却迅速而广泛。马可尼(Machonin, 1970)、约尼斯(Jones, 1971),还有其他一些学者(见Treiman & Ganzeboom, 1990)迅速地发表了针对两个

或三个国家的地位获得的比较研究结果。澳大利亚(Broom and Jones, 1969, 1976)和日本(Odaka & Nishihira, 1966)在1965年,捷克斯洛伐克(Machonin, 1969, Safar, 1971)在1967年分别开展了与OCG-I相仿的全国性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调查项目,其中有些甚至在内容的广度上还要略胜OCG-I一筹。其他国家大规模地模仿布劳和邓肯的研究则开始于1970年代初,时间上与弗泽尔曼(Featherman)和豪瑟尔在1973年对OCG的复制调查巧合。这样全国规模的分层与流动调查至少在13个国家进行过:1970年在法国(Thelet, 1982);1972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Goldthorpe, 1987)还有波兰(Andoka & Zagorski, 1980);1973年在澳大利亚(Jones & Davis, 1986)、加拿大(Boyd et al, 1985)、匈牙利(Andorka, 1983)、爱尔兰和北爱尔兰(Hout & Jackson, 1986, Hout, 1989)、和美国(Featherman & Hauser, 1978);1974年在以色列(Kraus & Hodge)和苏格兰(Payne, 1987);1975年在意大利(Ammassari, 1978)和日本(Tominaga, 1979)。所有这些研究都是专门针对分层与流动而设计的,它们都包含了详细的职业编码,而且除去少数例外情况,^①绝大多数都准备了单元纪录的数据文件^②(unit record data files)以供交换和公开发布。

就概念的测量来说,第二代研究中使用的主要是连续型变量。职业声望研究领域的长时间的积累终于导致了特莱曼(1977)对这一问题大范围的国际比较分析。事实证明,各个国家的职业声望量度具有高度的可比性,而将这些不同声望量度整合在一起的国际职业声望量表也逐渐被

- ① 加拿大的数据可供研究使用;但是因为加拿大统计局处于保密的目的,在公开发布的数据中去掉了详细的职业编码。法国的数据可以通过购买获得(但是价格高得令人望而却步)。意大利的数据还没有公开发布。
- ② 这里指的主要是社会调查获得的包含原始个人纪录的调查数据,主要与根据原始数据汇集成的汇总数据(aggregate level data)比较而言,比如说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汇总的各种交互表。——译者注

认可,进而成为进行职业声望比较分析的可靠指标。不过与此同时,弗泽尔曼和豪瑟尔指出声望指标低估了代际职业传递的程度因而质疑职业声望作为社会流动研究中职业指标的有效性。职业声望指标和社会经济指标最为关键的差别在于如何定位农民的位置。从职业声望角度看,世界各地的农民大体拥有中等的职业声望,但是他们在邓肯的社会经济指标中却处于靠近底层的位置。由于那些出身于农民家庭而本人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集中在熟练或半熟练的职业,而这些职业的声望和社会地位都很低,因而社会经济量表比职业声望量表显示出更大程度的代际职业流动。虽然一些国家建立了自己的社会经济量表,比如说加拿大(Blishen, 1967)和澳大利亚(Broom et al., 1977),但是在国际比较研究中与邓肯量表相对应的工具却一直未能问世(参见 Ganzeboom et al., 1989a)。

第二代分层与流动研究提出的研究问题和第一代有着很大的不同。布劳和邓肯的路径分析模型将传统的代际流动程度高低的问题,转化成为父亲职业对本人职业^①的直接影响与其他间接因素,特别是本人教育获得影响进行比较,以及这些间接因素的作用在多大程度上是通过本人的第一个职业而起作用的问题。在1962年的美国,父子职业之间的总相关系数是0.405。这个总相关系数可以被分解为两个部分:其中0.227(57%)是父亲职业通过教育获得对儿子现在职业产生的间接作用,而0.178(43%)则是控制了教育之后的父亲职业对本人现在职业的直接作用和通过本人第一个职业发生的间接作用。对于控制了教育作用之后的那一部分相关关系的分解显示0.063(16%)是由于父亲的职业地位对本人初职地位的影响进而影响到本人现在的职业;0.115(28%)是由于父亲的职业地位对本人现在

^① 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的代际地位传递研究的对象仅仅局限于男子,具体原因在稍后有所讨论。

职业的直接作用。在这一研究框架中另外一个有意义的参数是教育对本人现在职业地位的作用与父亲职业地位对本人现在职业作用之比(在不考虑本人初职的情况下)。在布劳和邓肯的模型中,该比例为2.9:1。这一结果确认了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在决定职业地位方面,个人的成就比家庭出身更为重要的结论。对于教育如何促进社会流动这个问题的答案因此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本人的职业地位和教育获得的关系要强过本人职业地位与父亲职业地位的联系,而且教育的作用基本上独立于家庭背景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的主要作用确实是促进社会流动。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教育又是社会不平等不断再生的主要原动力之一,因为大部分现存的社会不平等是通过教育获得过程来完成代际传递的。

布劳和邓肯主要的研究假设和第一代分层研究的主要假设之一相似:工业化增加了通过个人努力所取得的获得性因素在社会分层过程中的重要性,而削弱了诸如家庭背景之类先赋性因素的重要性(Parsons, 1940; Kerr et al., 1960; Lenski, 1966)。所不同的是,第一代分层研究的学者们认为工业化会提高社会总体的代际流动率,而布劳和邓肯则提供了一种更加完善的假设:随着社会的工业化,个人后天成就过程(achievement processes)——相对于父母地位的影响而言本人教育获得的影响——的重要性在不断增长;而同时先赋过程(ascriptive processes)——基于家庭背景的影响——的重要性在不断减弱。他们试图使用同批人比较(cohort comparisons)的方法,通过研究教育和初职的决定因素来检验这一假设在美国社会是否成立,但没有发现明显的趋势。

特莱曼(1970)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地位获得过程在不同社会之间如何变化的假设。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在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父母社会地位对本人的教育和目前职业地位的影响较之在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弱。虽

然这些假设没有通过大范围国际比较研究的检验,还是有人进行过一些有限的将美国与欠发达国家进行对比的努力。当然,试图通过比较两个或为数很少的几个社会来检验特定社会差异的做法有着明显缺陷。即使撇开这一点不谈,将美国作为比较研究的参照也容易混淆经济发展的作用和美国社会其他方面独特性可能发生的作用。

在工业化对社会流动的重要性在第二代研究中重新成为研究焦点之一的同时,政治结构作用的重要性也被提上了研究日程。希茨(Heath, 1981)提出并验证了在共产主义国家和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父亲职业地位对儿子职业地位的作用往往要比在政治上保守的国家为弱,而本人教育对本人职业地位的作用要比在政治上保守的国家强。在对玻利维亚革命的分析中,科利和科雷恩(Kelly & Klein, 1981)提出革命在短时期内(但不是长时期内)能够促进社会流动。

邓肯的研究催生了一系列附属性的研究问题。邓肯等人(1972)试图通过加入认知能力和动机变量(cognitive ability and motivational variables)的办法来扩展地位获得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塞维尔(Sewell)及其同事通过对一批高中毕业生长时期的观察研究极大地拓展了这一努力;塞维尔等人的研究产生了关于地位获得过程的社会心理层面文献的重要一部分(Sewell & Hauser, 1975)。其他学者研究了诸如居住地、民族、宗教,以及影响职业生涯的偶发因素,比如婚育情况对地位获得过程的影响。第一代研究中关于同类婚(homogamy)(Blau & Duncan 1967, Ch.10)和生育的问题在第二代研究也被重新拾起,而且在分析中应用了更为精致的统计模型。但是这些辅助性问题的研究很少建筑在国际比较的基础之上。

随着新的分析工具联立结构方程模型(simultaneous structural equations)的引入(Jöreskog, 1970),第二代分层研究在衡量以及修正不可靠度量的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柏伊尔比(Bielby)等人(1977)首先展示了如何将误差纠正技术引入代际职业获得模型。但是,这一发展也没有在国际比较研究中获得广泛应用。

最后,第二代分层研究也可以通过那些被它所遗漏的研究问题加以界定。其中最明显的一个遗漏是关于社会流动如何影响政治形成(political formations)^①的研究,而对于这个问题的考察曾经是第一代分层研究的重要领域。这一问题本来在第二代研究中应该是可以涉及的,其原因在于政治学家比社会分层学者建立了更为完善的代际分层流动研究设计的国际标准(Barnes et al 1979),对于他们来说,将父亲的职业和所支持的政党包括进社会调查的问卷中已经成为惯例;遗憾的是,分层学者基本上没有注意到这些发展。同等重要的是,有关生活方式以及其他社会地位(差异)所产生后果的项目在第二代分层研究所收集的数据中基本上消失了。准确地说,对文化意义上的社会不平等的研究兴趣一直存在于东欧国家(Wesolowski & Slomczynski, 1968; Machonin, 1969, 1970; Robert, 1984),只是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不为西方学者所知悉。这个话题通过文化再生产理论(Bourdieu & Passeron, 1977)的流行重新返回了代际分层流动研究的中心舞台(DiMaggio, 1982; DiMaggio & Mohr, 1985; Robinson & Garnier, 1985; De Graaf, 1988),但是还没有往国际比较的方向发展。

人们业已普遍认为,地位获得模型给社会流动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也给整个社会学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Kurz & Müller, 1987)。然而,如果说第二代分层研究并没有充分实现它关于比较分析的承诺亦不为过。地位获得模型被应用于许多国家,不光在欧洲和北美,而且包括拉美、东亚和撒哈拉以南黑非洲的许多国家(Treiman & Ganzeboom, 1990)。但是,大多数这样的比较分析仅仅包含

① 主要指正党认同和选举投票行为。——译者注

2~4 个国家, 因而几乎没有什么鉴别效力 (discriminatory power)。从已经发表的地位获得模型有关参数入手进行比较并不可行, 因为这些模型所包含的变量和测量方式都不相同。长久以来, 重新分析这些个体记录数据所需要的研究努力令人望而却步。而真正大规模的关于地位获得模型的国际比较研究直到最近才开始出现。特莱曼和伊普 (1989) 从 21 个国家的个人数据出发, 通过将教育 (受过多少年教育) 和职业地位 (Treiman 国际职业声望量表) 加以标准化, 进而建立了关于这些国家一个初步的地位获得模型。父子之间的相关系数平均为 0.345 (中位数), 其中的最小值为意大利的 0.226, 最大值为印度的 0.547 (更多信息向特莱曼索取)。其直接传承百分比的中位数为 45%, 其中最小值是 13% (瑞典), 最大值是 93% (印度)。本人教育作用与父亲职业作用之比的中位数为 3.1, 其中最大值为 16.0 (瑞典), 最小值为 0.3 (印度)。特莱曼和伊普 (Yip) 在他们的分析中明确地引入了宏观背景变量 (contextual variables), 他们的结果显示了工业化程度和地位获得模型诸要素之间存在很强的关系。

四 第三代研究

甚至在第二代分层研究还未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之前, 第三代分层研究就已经拉开了序幕。在 1970 年代初, 从事地位获得研究的国际社会学会分层研究委员会的成员们同意开展前面所列举的一系列 (经过松散协调的) 全国范围的社会调查研究 (Broom & McDonnell, 1974; Featherman et al., 1974)。这些调查大体完成于 1972 到 1976 年之间。就在这些为比较分析而搜集的数据刚刚就绪时, 豪瑟尔 (Hauser et al., 1975a; Hauser, 1978; Featherman & Hauser, 1978) 和古德索尔普 (Goldthorp & Llewellyn, 1977a,

b; Goldthorp et al., 1978; Goldthorp, 1987) 所做的杰出的开创性工作推动了社会分层研究中心的一次大规模转移。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被各种对数线性模型所取代; 在这些新的模型中, 由豪瑟尔 (1978) 提出的多水平模型 (levels model, 又叫“[多]类型模型”, topological model) 占据了主导地位。对数线性模型的推广者们认为, 与适用于连续数据的统计模型如相关或回归相比, 对数线性模型主要有两方面的优势: 首先, 对数线性模型提供了可以区分绝对流动 (absolute mobility) 和相对流动机会 (relative mobility chances) (相对流动机会又叫社会流动性 [social fluidity]) 的适当技术; 其次, 对数线性模型能够将双变量关系分解为多维度模式 (multidimensional pattern) 进行考察 (Hout, 1984), 特别是可以将对角线单元 (代表阶级结构的稳定性) 和非对角线单元的作用独立地引入模型。

一些学者完全基于方法论方面的考虑而转向对数线性模型, 另外一些研究者举出了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出发而转向的理由 (Goldthorp, 1987)。社会流动领域的阶级理论认为社会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讲是非连续且无顺序的, 因此第二代研究中所使用的具有层次性假设的量度方式和线性模型无法正确地揭示各个社会阶级之间的交换关系。而对数线性模型中的 (多) 水平模型则可以在不需要假设阶级顺序的情况下正确地处理阶级关系中任意两者间的配对比较和非对称性交换问题 (pairwise and asymmetric exchange relations)。

古德索尔普和穆勒 (Müller) 指导 (Erikson 是他们主要的合作者) 的 CASMIN 研究项目 (含义是“工业化国家社会流动比较分析”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 Nations]) 在某种程度上将 1970 年代晚期和 1980 年代非正式的第三代分层研究制度化了。CASMIN 项目将代际流动模式的比较研究扩展到了包括西欧和东欧的 13 个工业化国家 (使用 7×7 流动表); 该项目第一次试图

通过将许多国家社会流动调查所获得的高质量个体记录数据进行重新编码和标准化来进行代际流动跨国家比较研究。

从实证的角度来讲, CASMIN 取得了以下的结果: 首先, 一种定义宽泛的通用阶级分类 (EGP 分类, 来自 Erikson, Goldthorpe & Portocarero, 1979) 开始应用于这一领域。该阶级分类作为比较流动研究的标准职业阶级分类而获得广泛的接受。^① 在此影响下, 对教育的测量进行类似 EGP 分类的努力也已经开始 (Lüttinger & Krig 1988)。

其次, CASMIN 研究者们提出的阶级流动模型取得了关于代际职业流动中存在着多维性 (multidimensionality) 和非连续性 (discontinuities) 的结论性成果。埃利克森和古德索尔普 (1987a) 提出了 CASMIN 项目的“核心模型”: 一个附加了各种水平参数的对数线性模型——这些水平参数与流动模式中那些有实际意义的部分存在一一对应关系: 继承效应 (inheritance effects)、层次效应 (hierarchical effects)、部门效应 (sectoral effects), 还有 (不那么好解释的) (非) 亲和效应 (affinity effects)。

第三, CASMIN 研究者们宣称他们找到了支持以下这些结论的证据 (Erikson & Goldthorpe 1985, 1987a, b): (1) 在解释相对流动模式的时候, 继承效应和部门效应比层次效应更为重要。这直接挑战了地位获得研究所建立的关键假设之一 (详见后面的讨论); (2) 代际相对职业流动模式不存在很大的国家差异。相对流动的核心模型 (“共同社会流动性 [common social fluidity]”) 适用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 虽然不同的国家会呈现出 (对于核心模型) 不同

① 这一分类与国际标准职业分类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 (ILO 1969) 的关系在 Ganzeboom et al. (1989c) 的讨论中有所涉及。由国际劳动力办公室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发展的国际标准职业分类 (或者它的某种修订版本) 被许多国家的中央统计局采用。因此采用这个标准极大地提高了数据的可比性, 从而促进国际比较研究的发展。

程度的偏离, 但这些差异都可以用这些国家历史的独特性加以解释。但是需要指出的是: 瑞典这个具有长期社会民主传统的国家和美国这个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的相对流动比他们所分析的其他国家稍高。

但是其他的学者从相同数据中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王 (Wong, 1990) 通过比较 1970 年代美国、英国、匈牙利、日本、波兰和巴西的数据得出结论是这些国家的代际流动模式有很大不同。甘泽布姆 (Ganzeboom) 等人 (1989c) 在比较来自 35 个国家的 149 个 6×6 流动表时发现了不同国家之间流动表参数的差异很大; 这一发现对“共同社会流动性”的观点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其他的一些证据表明, 至少在某些国家相对代际流动的机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了: 法国 (Goldthorpe & Portocarero, 1981)、瑞典 (Erikson, 1976, 1983)、美国 (Hout, 1988)、匈牙利 (Ganzeboom et al., 1989b)、荷兰 (Ganzeboom & De Graaf, 1984, Luijkx & Ganzeboom, 1989)。甘泽布姆等人 (1989c) 还发现了在他们所比较的 18 个国家中有 16 个国家的相对流动机会显著增加, 而那些 (与“不流动”和“继承”效应) 相关联的参数以每年一到两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减。

CASMIN 研究项目所使用的多水平对数线性模型本身固有的一些缺陷或许可以解释这些互相矛盾的结果。这些模型最大的缺陷是它们无法刻画出某个流动体系的整体特征。比如说, CASMIN 的核心模型将相对流动分布的联系分解为 8 个不同的参数 (Erikson & Goldthorpe, 1987a)。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 这种多水平模型的统计鉴别效力是有限的, 因为它们将表和表之间的不同联系散布到多个自由度上面去; 而这一点被认为是比较分析最致命的一个缺陷 (Hauser, 1984a; Yamaguchi, 1987)。相比而言, 由古德曼 (Goodman, 1979) 提出而由豪瑟尔 (1984a) 首先应用于比较流动研究中的比例关联模型 (scaled association model) 具有更强的统计鉴别能力。古德曼-豪瑟尔模型首先估计一

个事后流动维度 (posteriori mobility dimension), 然后根据这一维度所揭示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相对流动机会来确定这些阶级之间的相对位置; 同样的, 不同的对角线单元 (或者其中的一部分) 可以赋予不同的参数而进行单独估计 (这些参数代表的是残留的非流动概率)。

据我们所知, 所有依据职业类别交换程度估计事后比例分数 (posteriori scale score) 的流动研究都发现在职业分类中存在一个惟一的或者非常的维度, 这个维度以专业人员、经理和大型业主为一端而以农业工人为另一端。无论这些从职业类别交换程度导出事后比例系数的方法是古德曼-豪瑟尔模型 (Hauser, 1984a; Ganzeboom et al., 1989c)、多维比例分析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Lauman & Guttman, 1966; Blau & Duncan, 1967), 还是标准相关分析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Klatzky & Hodge, 1971; Domanski & Sawinski, 1986, 1987), 这个维度的存在都非常明显并与以社会经济地位为基础的职业阶级顺序吻合。如果说真的有什么东西并不随着时间和国家的不同而改变的话, 那恐怕就是这个存在于各个职业阶级之间在相对流动机会方面的简单模式: 决定不同职业群体之间交换概率的主要因素是他们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相似性。这主要是因为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是促进社会优势代际传递各种资源的一个很好的标志, 因而也是这些优势获取程度的一个很好的标志。值得指出的是, 在 CASMIN 核心模型的四个成分中有三个 (层次效应、部类效应、亲和效应) 是与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 而只剩下继承效应作为离散性 (discreteness) 的主要形式。

第三代分层流动研究大大地缩小了这个研究领域的范围。对数线性模型实际上告诉我们的仅仅是二元分布的信息。稍早一些涉及多变量的研究问题以及许多第一代和第二代研究中提出的辅助性研究问题都从第三代研究的日程中去掉了 (虽然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在文献中仍然时有出

现)。第三代研究中一些有关父亲职业、本人最初职业以及本人现在职业阶级地位关系的研究 (关于代内流动的研究) (Hope, 1984; Erikson & Goldthorpe, 1987c); 关于代际职业阶级地位传递过程中教育所起作用的研究 (Yamaguchi, 1983; Hout, 1988; Müller et al., 1988; Semyonov & Robert, 1989), 以及关于同类婚 (homogamy) 的研究; 但是关于这些问题的国际比较分析并没有取得很大发展。奇怪的是, 第三代分层研究虽然强调阶级的概念, 却忽略了和阶级分析方法紧密相连的那些研究问题: 阶级流动和政治形成 (Kurz & Müller, 1987)。还有就是关于数据可靠性的问题也被完全忽略了。大家满足于这样的想法: 如果一些问题在以前的研究中没有解决的话, 那么这些问题就已经被束之高阁了。

从理论发展的层次来说, 第三代分层研究没有贡献很多新的想法。有趣的事, 在 CASMIN 项目之前的研究中, 埃里克森和古德索尔普 (Erikson et al., 1979) 非常关注政治制度对流动模式的影响, 他们指出虽然法国、英国和瑞典的经济发展程度相似但是政治气候迥异。而且他们大多数关于 CASMIN 国家之间不同之处的讨论 (Erikson & Goldthorpe, 1987b) 涉及经济和工业发展之外的因素: 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制度化关系 (比如德国的学徒制度 [the German Lehrstelle system]) 被认为制造了非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阶级之间的鸿沟; 瑞典的社会福利制度和程度很低的收入差别被认为促进了社会的流动; 匈牙利和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废除私有财产被认为降低了职业阶级继承的程度。这些零星的发现预示了建立关于社会流动的制度化理论的可能性, 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框架。

五 新的发展

几乎就在代际分层研究的重心向对数线性模型发生转移的同时,该领域在其他方面还取得了一些进展。还有人针对迄今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新的分析策略提出建议。我们下面从6个方面讨论这些新的发展和建设。

1. 数据收集方面新的进展

虽然三代分层研究所使用的核心数据都明确地以分层与流动研究为目的,越来越多的原本为其他研究目的而收集的数据也开始被应用于比较分层研究当中。许多国家开始进行一年一度或两年一度的社会调查,例如美国的通用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这类调查大多数起源于(社会)态度和价值研究领域。迄今为止已经有来自12个国家的学者参加了“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Becker et al., 1990);他们一致同意在未来每年的问卷中加入关于某一特殊问题的通用模块(每年的问题不一定相同),再加上一些与代际流动研究密切相关的社会、人口、家庭背景等方面的共同问题;第二,人口学调查和选举调查被证明是进行代际流动研究的丰富资源(Niemi et al., 1985)。在上述领域里的国际合作都比分层研究领域的合作更为成功。

适用于基本的代际流动模型的数据越来越丰富是一件令人鼓舞的事情;通过不断加入更多的国家和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数据,能够极大地提高比较分析的统计解释能力。(分析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数据)一方面会产生更完善的历史比较分析,另一方面也能够减少因单个国家内部随机误差而导致对该国流动模式的错误理解。由于社会流动率跨时间和跨国家的真实变动可能是相当有限的(长期变化有可能非常显著),因此减少随机误差和提高统计解释能力应

该成为从事社会分层国际比较分析(以及其他国际分层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因为随机误差的缘故)将来的研究(建筑在更加广泛的数据和更加系统化的分析技术的基础上)很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早期研究忽略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差别,它们淹没在(因为数据不完善而导致的)随机误差中。

2. 新的分析方法:历史事件模型

目前,社会分层领域又一次呼应着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历史事件模型。尽管有些早期的分层流动调查包括了详尽的教育和职业历史,在历史事件模型引入之前(Tuma & Hannan, 1984; Blossfeld et al., 1989),研究者并没有找到充分利用这些数据的有效方法(Blau-Duncan模型通过引入本人初职和本人现职提供了一种初级的方法来研究事业生涯[career])。搜集事业生涯中每一个职业的信息,并将个人做过的每一个工作或者每一个时间段(比如每年)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而不是个人)——这种做法使得同时分析事业结构(career structure)和历史作用(historical effects)成为可能(Blossfeld, 1986)。同时,这种做法还提供了解决一个流动表模型和地位获得模型共有的问题:在这些研究所谓的“流动”与具体的时间、时代因素相脱节,因而这些研究无法将社会流动与存在其间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并将其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下去考察和理解(Sørensen, 1986)。

迄今为止,除阿尔曼丁格尔(Allmendinger, 1989)的研究之外,文献中鲜见有关工作历史的比较分析。历史事件的研究者们还经常忽略代际分层研究中的那些核心问题。虽然并没有什么规则禁止在职业生涯研究中加入家庭背景的因素(这样做相当于对被访人的事业生涯在两个时点——被调查时和被访人的父亲对被访人发挥影响时——的详细分析),却很少有人这样做(Sørensen & Blossfeld, 1989是一个例外)。最后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包含历史事件信息

的调查数据为数不多,而且其中三个主要数据——美国、挪威和德国研究(Allmendinger, 1988)——只涵盖了数目有限的出生同批人(birth cohorts)。

3. 多重指标和同胞模型(Multiple Indicator and Sibling Models)

多重指标方法(multiple indicator approach)是过去10年当中分层研究里的一个有趣的死胡同。显然,和其他类型的数据一样,分层研究数据也面临信度和效度的问题。填答错误、编码错误、重编码错误,还有不同研究项目之间测量指标的不兼容性,这些都会对数据的质量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这些影响导致了在地位获得模型中对直接作用(相对于间接作用而言)的过高估计(Kelly, 1973a)。标准的措施是改进测量指标或者将明显不可靠的数据弃置不用,而不是通过多重指标设计想办法进行重复测量。虽然文献中有一些有趣而且可行的多重指标分析方法,但是后来研究者却缺乏重复并拓展这些研究的兴趣。柏伊尔比等人(1977)和豪瑟尔等人(1983)使用从不同时点进行的访谈中获得的重复测量实现了多重指标设计。其他研究者或者通过再次造访他们研究过的部分样本,或者通过使用婚姻记录来衡量有关父母地位的测量指标的可靠性(Broom et al, 1978; Massagli & Hauser, 1983);使用这种数据的一个显而易见的策略是将已知的或者估计出的可靠性参数(reliability coefficients)应用于地位获得模型。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建议是同时使用本地指标和国际通用指标来估计多重指标模型,并通过这样的模型来克服国际比较中的不可比性问题。

同胞模型(siblings model)是与多重指标方法密切相关但发展得比后者还要不充分的一种方法(Taubman, 1977; Hauser & Mossel, 1985; Hauser & Sewell, 1986)。这个方法的实质就是向代际分层模型中引入出自同一个家庭的两个或者多个子女的信息。同胞模型提供了关于父母对子女

(职业)成就所产生的总体影响的无偏估计(而标准设计却无法避免缺失变量[omitted variable bias]所产生的偏差)(Hauser, 1984b; Hauser & Mossel, 1985)。因此同胞模型可以用来直接考察代际流动研究中的中心问题: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的程度和决定因素(有趣的是, Duncan 预见到了这个发展:为了得到关于父母影响更好的估计,他在路径模型中使用了被访人长兄的信息——Blau & Duncan, 1967: Ch. 9)。如果信息是从至少两个兄弟姐妹那里独立地搜集来的,多重指标测量就同时具有了同胞方法固有的优势,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被访者都可以提供模型中所需信息的一个独立的测量(Hauser & Wong, 1989)。据我们所知,虽然这种类型的数据已经存在,但还没有人进行这方面的比较研究。

4. 定类变量的多元统计分析

代际分层研究下一步很自然地是要把第二代和第三代研究的优点结合起来,在估计比较复杂的多元统计模型的同时充分地考虑社会分层核心变量的非连续性(discreteness)和非一致性(non-uniformity)的特征。显然,将所有变量进行完善的定类处理这一设想仍然超出了我们现有的能力;在现阶段我们能够做到的是(将一些核心变量做定类处理的同时)将另外一些变量当作连续变量处理,从而估计某种混合模型(mixed models)(Winship & Mare, 1983)。一种可行的方法是将对数线性模型用(同时包含连续自变量和离散自变量的)logit模型的形式重新表述(Logan, 1983)。通过这样的变换,可以将布劳-邓肯模型中的中介变量(intervening variables)(特别是教育获得)整合进代际职业流动表模型中去。

这种logit模型之一——顺序logit模型(ordered logit model)——已经在教育获得(地位获得模型的重要部分之一)的出生同批人分析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研究升学过程(school transition)时,为了将父母背景对每次升学概

率所起作用从边际分布 (marginal distribution) 的作用 (随着现代教育系统的扩展, 无论人们的家庭背景如何, 他们总体来讲要比他们的父母接受更高的教育, 这一趋势如果没有在模型中得到适当的控制会影响整个模型的可信度) 中区分出来, 麦里 (Mare, 1981) 使用了顺序 logit 模型。正如他的研究所揭示的, 美国父母的社会背景对子女升学的影响在低年级要比在高年级显著。这一发现被一系列后续的研究证实: 史密斯和张 (Smith & Chung, 1986) 的菲律宾研究, 沙维特和克劳斯 (Shavit & Kraus, 1990) 的以色列研究, 还有在 1990 年马德里国际社会学会议 (World Congress of Sociology) 宣读的一系列论文中所包括的其他一些国家 (即将在 Shvit & Blossfeld 1991 年编辑的书中出版)。根据这一模式, 再加上正规教育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张这一不争的事实, 可以推断父母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的回归系数会逐渐减弱 (假设这一合成效果没有被历史上不断增加的在较高年级上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所抵消)。这一发现提供了关于代际职业流动研究揭示出的不断增加的相对职业流动 (relative mobility) 的一种可能解释。在另外一个对于美国社会分层的多元分析中, 霍特 (Hout, 1988) 发现父亲职业对教育程度较低的人职业的影响, 比对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职业的影响要强; 这一发现提供了另外一个关于教育增长如何促进社会流动与社会开放的研究假设。

5. 妇女与家庭

由于分层研究对于职业地位的偏重, 分层学者发现很难在自己的研究中处理有关妇女的问题 (Acker, 1973)。首先, 社会调查被访者的同龄人当中许多已婚妇女没有工作, 而被访者的上代人的情况更是如此。另外, 妇女的职业分布和男子的职业分布差别太大, 以至于无法将现有 (适用于研究男子职业地位) 的地位量度和阶级分类直接应用于对于妇女的研究中去 (Bielby & Baron, 1986)。面对这样的

困难, 许多第一代和第二代主要的研究项目在搜集数据时简单地将妇女排除在样本之外。因此我们有关妇女的代际流动国际比较的知识主要来自其他一些来源而不是那几个主要的社会分层与流动调查 (Roos, 1985)。鲁斯 (Roos) 的研究显示了除了父亲职业对女儿职业的直接影响比对儿子职业直接影响要弱之外, 在世界范围内男子和妇女的职业地位获得过程大体相同。但是另外一方面, 妇女的职业阶级地位却与男子大不相同, 而且妇女职业阶级地位与父亲阶级地位的关系明显弱于男子, 特别是与阶级的非流动性 (immobility) 相关的方面 (Portocarero, 1983a, b)。和男性相比, 更多的妇女能够从父亲的职业阶级向上流动 (比如说, 她们的社会地位总体来说比相同家庭出身的男性更高); 但是这一结论有可能是两个因素作用的结果: (1) 未就业的妇女被排除在样本之外; (2) 研究中所使用的地位量度是以男性的职业结构为基础的 (Blisshen & Carroll, 1978; Boyd, 1982)。

在解释为什么要将妇女从流动研究中排除的时候, 一种传统的说法是因为分层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不是个人, 而丈夫的社会地位决定了整个家庭的生活机会。但是这第二个假设正变得越来越成问题 (假如说它不是从一开始就成问题的话)。近些年来, 关于丈夫与妻子地位对家庭社会特征的影响的问题已经在英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Goldthorpe, 1983, 1984; Erikson, 1984; Heath & Britten, 1984; Stanworth, 1984; Goldthorpe & Payne, 1986)。

在未来分层研究中应该包括妇女, 这一点已经在研究者当中形成了共识; 但是在为什么应该考虑和应该如何考虑妇女的地位的问题上还有另外一些东西值得一提。如何量度妇女的职业地位是一个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和男子相比, 妇女集中在数目有限的职业类别中, 这一特性应该在未来设计度量指标和建立结构模型时充分考虑进去。除此之外, 未来的分层研究应该将“家庭是分层的基本单位”

这种说法作为一个需要进一步验证的实证研究问题,而不仅仅是关于定义的争论。这就需要发展出一种可以衡量每个家庭成员的地位特征(和出身)如何共同影响家庭,而不是以个人为基本单位测量的地位结果(status outcome)的新模型(Haller, 1981)。这一问题的提出为“同类婚”(homogamy)这一个老问题的研究赋予了新的含义(Ultee & Luijkx, 1990)。有意思的是,这—问题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及传统的核心家庭衰落的过程而逐渐获得重视的;在这种新的环境下,家庭的社会分层和个人的社会分层产生了实质上的差异。

6. 社会流动的结果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第二代分层研究中对于社会流动所产生的结果的重视程度远不如第一代(仅有的两个例外是 Hodge & Treiman, 1966 关于种族偏见的研究和 Hodge, 1986 关于收入的研究),而第三代分层研究基本上将这个问题搁置一旁。尽管如此,这方面的研究在分析技术方面还是取得了一项重要进展:索贝尔(Sobel, 1981)的“对角线流动”模型(diagonal mobility models)。这个模型提供了衡量两个包含相同类别的定类变量(比如说父亲职业和儿子职业)对某一因变量作用的相对重要性的工具;该模型还可以对两个定类自变量类别的任意组合(比如说父亲是蓝领工人而本人是专业人员)对因变量产生的作用做出估计。通过这个模型,我们可以检验社会流动本身产生的影响是否大于(社会流动的)起点和终点所产生的影响的简单之和;而这一点是早期分层研究经常争论的问题之一(比如, Janowitz, 1958; Lipset, 1960)。索贝尔(1985)将该模型应用于生育研究。另外一个例子是最近关于投票行为的研究(De Graaf & Ultee, 1990)。对流动结果的国际比较分析是这一领域下一步要做的事情。

六 结 论

比较社会流动研究在过去40年的发展可以简单总结如下:

这一领域在数据搜集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可供比较流动研究使用的数据从早期屈指可数而且完全从西方工业化国家搜集到的非代表性样本(或者样本代表性未知)社会调查所发表的高度汇总(aggregated)的二维交叉表,到今天来自世界各地许多国家通过高质量随机样本调查所得的个体记录数据(unit record data)。这些新的个体数据都包含许多变量,特别是详细的职业和教育分类。许多国家还进行了不止一个这样的调查。但是迄今为止,许多这样的数据还没有被比较流动研究或者地位获得研究充分加以利用。

比较流动研究在测量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职业地位的测量已经朝着国际化的方向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越来越多的社会调查数据采用了国际标准职业分类ISCO(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s, ILO 1969)。在ISCO的框架内,学者们进一步设计出了几套不同的标准化职业测量方案。对于教育获得的国际比较测量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解决。

在数据分析技术方面,比较流动研究经历了从对比流入和流出百分比(inflow and outflow percentage)向多元回归模型进而向对数线性模型转变的过程。从考察两变量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个转变无疑是一个进步,因为对数线性模型可以将代际职业流动表(的二元分布)分解为意义明确的不同成分,并且在控制了边际分布的情况下考察(变量间)的联系模式(association patterns)。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从第二代向第三代研究的转变从某种程度上

讲又是一种倒退,因为迄今为止对数线性模型还没有能够有效地用来解决多变量问题,而这一点对于第二代研究所使用的统计方法来说却是轻而易举。

在实证内容方面,就是说在研究问题的提出和完善(problem development)方面,这三代流动研究体现出相当程度的稳定性。如果说代与代之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第二代研究提出问题的范围比第一代研究大为收缩,而第三代研究又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收缩——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一种不幸的变化。在研究指导理论方面,这三代流动研究也呈现出很强的连续性。这主要表现在两种理论假设——经济发展(现代化)理论和制度理论——之间的争论几乎贯穿了这三代分层研究的始终。我们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关于社会流动的现代化理论发展得较为充分,这一点与各种各样关于制度化因素对社会流动模式影响的观点形成对比——后者直到今天仍然处于非常不完善的状态。

最后,在研究成果方面,我们发现一些重要的预见获得了证实(虽然为数很少)。在我们看来,三代的流动研究取得了如下关于代际分层流动模式的结论:

在世界范围内,社会经济地位(以 Duncan 的 SEI 为代表)是代际职业流动的主要驱动力;尽管是否存在其他的因素以及这些其他因素性质如何还有争论,但是和社会经济地位相比,这些因素的作用显然都是次要的。

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着代际职业的非流动(immobility),而且这种非流动的程度超出了从社会经济地位分布角度所预期的水平。非流动主要发生在拥有相当财产(农场、商业和专业技能)的社会阶级中,可以部分地归因于产权的直接转移。这种过度的职业继承构成了社会分层过程中离散性(discreteness)的主要部分。

代际职业流动的模式因时间和国家而异。二战以来多数国家相对流动(relative mobility)经历了缓慢但具有系统

性的增长。一些国家的相对流动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和瑞典)。但是对于导致这种长期变化以及显著国际差异的背景因素(contextual factors)的作用还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

关于地位获得的研究明白无误地显示教育正在取代父母职业而成为决定未来职业地位最重要的因素,而教育作用的绝大部分又独立于家庭背景。但是同时,教育又是代际之间传递优势的重要机制。

显然,在有关不同国家之间代际社会流动的结构和过程的相似性以及差异性方面已经牢固建立起的结论还为数不多,在这些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参考文献

- Abramson, P.R., 1973: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Mobility and Partisan Preference in Britain and Italy: a Cross National Comparis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6: pp.221~234.
- Acker, J., 1973: "Wome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a Case of Intellectual Sex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pp.936~945.
- Allmendinger, J., 1988: *Career Mobility Dynamic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United States, Norway, and West Germany*.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 Allmendinger, J., 1989: "Educational Systems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5: pp.231~250.
- Ammassari, P., 1978: "Occupational Satisfac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14: pp.219~232.
- Andorka, R., 1983: "Age, Cohort, and Historical Factors Influencing Inter- and 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 of Men and Women in Hungary."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2: pp.197~248.
- Andorka, R., Zagorski, K., 1980: *Socio-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Hungary and Poland. Warsaw: Polish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Barber, J.A., 1970: *Social Mobility and Voting Behavior*. Chicago: Rand McNally.

Barnes, S.H., Kaase, M., Allerbeck, K.R., Farah, B.G., et al., 1979: *Political Action: Mass Participation in Five Western Democracies*. Beverly Hills: Sage.

Becker, J.W., Davis, J.A., Ester, P., Mohler, P.P., (eds.). 1990: *Attitudes to Inequalit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Rijswijk, Netherlands: Social and Cultural Planning Office.

Berent, J., 1954: "Social Mobility and Marriage, a Study of Trends in England and Wales." pp.321 ~ 338 in Glass, D. V. *Social Mobility in Britain*. London: Routledge.

Bielby, W. T., Baron, J. N., 1986: "Men and Women at Work: Sex Segregation and 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pp.759~799.

Bielby, W. T., Hauser, R. M., Featherman, D. L., 1977: "Response Errors of Black and Nonblack Males in Models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 pp.1242~1288.

Abramson, P. R., 1973: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mobility and partisan preference in Britain and Italy: a cross national comparison. *Comp. Pol. Studies* 6: pp.221~234.

Acker, J., 1973: Wome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a case of intellectual sexism. *Am. J. Sociol.* 78: pp.936~945.

Allmendinger, J., 1988: *Career Mobility Dynamic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United States, Norway, and West Germany*. Ph.D. thesis. Harvard.

Allmendinger, J., 1989: Educational systems and labor market outcomes. *Eur. Sociol. Rev.* 5: pp.231~250

Ammassari, P., 1978: Occupational satisfaction 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nt. Rev. Sociol.* 14: pp.219~232.

Andorka, R., 1983: Age, cohort, and historical factors influencing inter- and intragenerational mobility of men and women in Hungary. *Rsrch. Social Strat. & Mob.* 2: pp.197~248.

Andorka, R. Zagorksi, K., 1980: *Socio -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Hungary and Poland*. Warsaw: Polish Acad. Sci., Institute Philosophy & Sociology.

Barber, J. A., 1970: *Social Mobility and Voting Behavior*. Chicago: Rand McNally.

Barnes, S. H. et al., 1979: *Political Action: Mass Participation in Five Western Democracies*. Beverly Hills: Sage.

Becker, J. W., Davis, J. A., Ester, P., Mohler, P. P. eds., 1990: *Attitudes to Inequalit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Rijswijk: Social and Cultural Planning Office.

Berent, J., 1954: *Social mobility and marriage, a study of trends in England and Wales*. See Glass, 1954, pp.321~338.

Bielby, W. T., Baron, J. N., 1986: Men and women at work: sex segregation and 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 *Am. J. Sociol.* 91: pp.759 ~ 799.

Bielby, W. T., Hauser, R. M., Featherman, D. L., 1977: Response errors of black and nonblack males in models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Am. J. Sociol.* 82: pp.1242~1288.

Blau, P. M., Duncan, O. D.,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Wiley.

Blishen, B. R., 1967: A socio-economic index for occupations in Canada. *Can. Rev. Sociol. & Anthro.* 4: pp.41~53.

Blishen, B. R., Carroll, W. K., 1978: Sex differences in a socioeconomic index for occupations in Canada. *Can. Rev. Sociol. & Anthro.* 15: pp.352~371.

Blossfeld, H. - P., 1986: Career opportunities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a dynamic approach to study life course, cohort, and period effects. *Eur. Sociol. Rev.* 2: pp.208~225.

Blossfeld, H. - P.; Hamerle, A., Mayer, K. U., 1989: *Event History*

Analysis: Statistical Theory and Applic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Hillsdale, N.J.: Erlbaum.

Bourdieu, P., Passeron, J. - C., 1977: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Transl. R. Nice: Beverly Hills: Sage.

Boyd, M., 1982: Sex differences in the Canadian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process. *Can. Rev. Sociol. & Anthro.* 19: pp.1~28.

Boyd, M. et al., 1985: *Ascription and Achievement: Studies in Mobility and Status Attainment*. Ottawa: Carleton Univ. Press.

Broom, L., Jones, F. L., 1969: Father - to - son mobility: Austral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Am. J. Sociol.* 74: pp.233~243.

Broom, L., Jones, F. L., 1976: *Opportunity and Attainment in Austral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 Press.

Broom, L., McDonnell, P. 1974: Current research on social mobility: an inventory, *Current Sociology* 22: pp.353~391

Broom, L., Duncan - Jones, P., Jones, F. L., McDonnell, P., 1977: The social standing of jobs: scores for all Australian occupations. *Social Sci. Rsrch.* 6: pp.211~224.

Broom, L., Jones, F. L., McDonnell, P., Duncan - Jones, P., 1978: Is it true what they say about daddy? *Am. J. Sociol.* 84: pp.417~426.

Campbell, R. T., 1983: Status attainment research: end of the beginning or beginning of the end? *Sociol. Educ.* 56: pp.47~62.

Carlsson, G., 1958: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Lund: Gleerup.

Cheal, D. J., 1983: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transfers. *J. Marriage & Family* 45: pp.805~813.

Connor, W., 1979: *Socialism, Politics, and Equality: Hierarchy and Change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USSR*.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Cutright, P., 1968: Occupational inheritance: a cross - national analysis. *Am. J. Sociol.* 73: pp.400~416

De Graaf, N. D., Ultee, W., 1990: Individual preferences, social mobility, and election outcomes. *Electoral Studies* 9: pp.109~132.

De Graaf, P. M., 1988: Parents' financi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grades, and transition to secondary school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Eur. Sociol. Rev.* 4: pp.209~221.

DiMaggio, P., 1982: Cultural capital and school success: the impact of status culture participation on the grades of U.S. high school students. *Am. Sociol. Rev.* 47: pp.189~201.

DiMaggio, P., Mohr, J., 1985: Cultural capital,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marital selection. *Am. J. Sociol.* 90: pp.1231~1261.

Domanski, H., Sawinski, Z., 1986: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Poland, 1972~1982. *Social Sci. Inf.* 25: pp.825~844.

Domanski, H., Sawinski, Z., 1987: Dimensions of occupational mobility: the empirical invariance. *Eur. Sociol. Rev.* 3: pp.39~53.

Duncan, O. D., 1961: A socioeconomic index for all occupations. In *Occupations and Social Status*, ed. A. J. Reiss Jr., pp.109~138. New York: Free Press.

Duncan, O. D., 1966a: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the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In *Social Structure and Mobility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ed. N. J. Smelser, S. M. Lipset, pp.51~97. Chicago: Aldine

Duncan, O. D., 1966b: Path analysis: sociological examples. *Am. J. Sociol.* 72: pp.1~16.

Duncan, O. D., Hodge, R. W., 1963: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al mobility: a regression analysis. *Am. J. Sociol.* 68: pp.629~644.

Duncan, O. D., Featherman, D. L., Duncan, B., 1972: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and Achievement*. New York: Academic.

Erikson, R., 1976: Patterns of social mobility. In *Readings in Swedish Class Structure*, ed. R. Scase, pp.171~200. Oxford: Pergamon.

Erikson, R., 1983: Changes in soci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 nations: the case of Sweden, *Rsrch. Social Strat. & Mob.* 2: pp.165~195.

Erikson, R., 1984: Social class of men, women and families, *Sociology* 18: pp.500~514.

Erikson, R., Goldthorpe, J. H., 1985: Are American rates of social mobility exceptionally high? New evidence on an old issue. *Eur. Sociol.*

Rev. 1: pp.1~22.

Erikson, R., Goldthorpe, J. H., 1987a: Commonality and variation in social fluidity in industrial nations, Part 1: A model for evaluating the 'FJH hypothesis'. *Eur. Sociol. Rev.* 3: pp.54~77.

Erikson, R., Goldthorpe, J. H., 1987b: Commonality and variation in social fluidity in industrial nations, Part 2: The model of core social fluidity applied. *Eur. Sociol. Rev.* 3: pp.145~166.

Erikson, R., Goldthorpe, J. H., 1987c: Work Life and Intergenerational Class Mobili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Mannheim: CASMIN Working Paper 10.

Erikson, R., Goldthorpe, J. H., Portocarero, L., 1979: Intergenerational class mobility in three Western European societies: England, France and Sweden. *Brit. J. Sociol.* 30: pp.415~451.

Featherman, D. L., 1971: A research note: A social structural model for the socioeconomic career. *Am. J. Sociol.* 77: pp.293~304.

Featherman, D. L., 1973: Comments on models for the socioeconomic career. *Am. Sociol. Rev.* 38: pp.785~790. See also Kelley 1973a, b.

Featherman, D. L., 1981: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two decades of cumulative social science. *Am. Behav. Scientist* 24: pp.364~385.

Featherman, D. L., Hauser, R. M., 1976: Prestige or socioeconomic scales in the study of occupational achievement? *Sociol. Meth. & Rsrch.* 4: pp.403~422.

Featherman, D. L., Hauser, R. M., 1978: Opportunity and Change. New York: Academic.

Featherman, D. L., Hauser, R. M., Sewell, W. H., 1974: Toward comparable data on inequality and stratification: perspectives on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national mobility studies. *Current Sociol.* 22: pp.383~397.

Fox, T. G., Miller, S. M., 1965: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determinants of mobility: an international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Acta Sociologica* 9: pp.76~93.

Ganzeboom, H. B. G., De Graaf, P., 1984: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

tional mobility in the Netherlands in 1954 and 1977: a log linear analysis.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in the Netherlands*, eds. B. F. M. Bakker, J. Dronkers, & H. B. G. Ganzeboom, pp.71~90. Amsterdam: SISWO.

Ganzeboom, H. B. G., De Graaf, P. M., Treiman, D. J., 1989: A standard 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of occupations. Revised version of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 Meet. Am. Sociol. Assoc., San Francisco.

Ganzeboom, H. B. G., Luijkx, R., Robert, P., 1989: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Hungary between 1930 and 1986: a loglinear analysis with logmultiplicative scaled association models. Tilburg, Neth.: Univ. Tilburg, Dept. Sociol. Working Paper 3.

Ganzeboom, H. B. G., Luijkx, R., Treiman, D. J., 1989: Intergenerational class mobilit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Rsrch. Social Strat. & Mob.* 9: pp.3~79.

Glass, D. V. ed., 1954: *Social Mobility in Britain*. London: Routledge.

Goldthorpe, J. H., 1983: Women and class analysis: in defense of the conventional view. *Sociology* 17: pp.465~488.

Goldthorpe, J. H., 1984: Women and class analysis: a reply to replies. *Sociology* 18: pp.491~499.

Goldthorpe, J. H., 1985: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mobility. *Brit. J. Sociol.* 36: pp.549~573.

Goldthorpe, J. H., 1987: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 2nd ed. Oxford: Clarendon.

Goldthorpe, J. H., Llewellyn, C., 1977a: Class mobility: intergenerational and worklife patterns. *Brit. J. Sociol.* 28: pp.269~302.

Goldthorpe, J. H., Llewellyn, C., 1977b: Class mobility in Modern Britain: three theses examined. *Sociology* 11: pp.257~287.

Goldthorpe, J. H., Müller, W., 1982: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Formation in Industrial Nations: Proposal for a Comparative Research Project*. Oxford/Mannheim.

Goldthorpe, J. H., Payne, C., 1986: On the class mobility of women: results from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the analysis of recent British Data.

Sociology 20: pp.531~555.

Goldthorpe, J. H., Portocarero, L., 1981: La mobilité sociale en France: nouvel examen [Social mobility in France: a new examination]. *Revue Française de la Sociologie* 22: pp.151~166.

Goldthorpe, J. H., Payne, C., Llewellyn, C., 1978: Trends in class mobility. *Sociology* 12: pp.441~468.

Goodman, L.A., 1979: Multiplicative models for the analysis of occupational mobility tables and other kinds of cross-classification tables. *Am. J. Sociol.* 84: pp.804~819.

Grusky, D. B., Hauser, R. M., 1984: Comparative social mobility revisited: models of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in 16 countries, *Am. Sociol. Rev.* 49: pp.19~38.

Hall, J. R., 1954: A comparison of the degree of social endogamy in England and Wales and the U.S.A. See Glass 1954, pp.344~348.

Haller, M., 1981: Marriage, wome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a theoretical critique. *Am. J. Sociol.* 86: pp.766~795.

Hauser, R. M., 1978: A structural model for the mobility table. *Social Forces* 56: pp.919~953.

Hauser, R. M., 1984a: Vertical class mobility in Great Britain, France and Sweden, *Acta Sociologica* 27: pp.87~110, pp.387~390.

Hauser, R. M., 1984b: Some cross population comparisons of family bias in the effects of schooling on occupational status. *Social Sci. Rsrch* 13: pp.159~187.

Hauser, R. M., Mossel, P. A., 1985: Fraternal resemblance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occupational status. *Am. J. Sociol.* 91: pp.650~673.

Hauser, R. M., Sewell, W. H., 1986: Family effects in simple models of education, occupational status and earnings: findings from the Wisconsin and Kalamazoo studies. *J. Labor Econ.* 4: pp.83~115.

Hauser, R. M., Wong, R. S. K., 1989: Sibling resemblance and intersibling effect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Sociol. Educ.* 62: pp.149~171.

Hauser, R. M., Tsai, S. L., Sewell, W. H., 1983: A model of stratification with response error in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variables. *Sociol. Educ.* 56: pp.20~46.

Hauser, R. M., Koffel, J. N., Travis, H. P., Dickinson, P. J., 1975a: Temporal change in occupational mobility: evidence for 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 Sociol. Rev.* 40: pp.279~297.

Hauser, R. M., Dickinson, P. J., Travis, H. P., Koffel, J. N., 1975b: Structural changes in occupational mobility among 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Am. Sociol. Rev.* 40: pp.585~598.

Hazelrigg, L. A., 1974: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s of father-to-son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 Reader*, ed. J. Lopreato, L. C. Lewis, 469-93. New York: Harper & Row.

Hazelrigg, L. A., Garnier, M. A., 1976: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differential access to occupational ranks in seventeen countries. *Am. Sociol. Rev.* 41: pp.498~511.

Heath, A., 1981: *Social mobility*. Cambridge UK: Fontana.

Heath, A., Britten, N., 1984: Women's jobs do make a difference: a reply to Goldthorpe, *Sociology* 18: pp.475~490.

Hodge, R. W., Treiman, D. 1966. Occupational mobility and attitudes toward Negroes. *Am. Sociol. Rev.* 31: pp.93~102.

Hodge, R. W., Kraus, V., Cheng, M. T., Treiman, D. J., 1986: Intergeneration occupational mobility and income. *Social Sci. Rsrch.* 15: pp.297~322.

Hope, K., 1984: Intergenerational and career mobility in Britain: An integrated analysis. *Social Sci. Rsrch.* 13: pp.20~37.

Hout, M., 1984: Status, autonomy, and training in occupational mobility. *Am. J. Sociol.* 89: pp.1379~1409.

Hout, M., 1988: More universalism, less structural mobility: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in the 1980s. *Am. J. Sociol.* 93: pp.1358~1400.

Hout, M., 1989: *Following His Father's Footsteps*.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Hout, M. Jackson, J. A. , 1986: Dimensions of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the Republic of Ireland, *Eur. Sociol. Rev.* 2: pp.114~137.

Inkeles, A. , Rossi, P. , 1956: National comparisons of occupational prestige. *Am. J. Sociol.* 61: pp.329~339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ILO) . , 1969: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s. Rev. ed., 1968.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Janowitz, M. , 1958: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in West Germany. *Am. J. Sociol.* 64: pp.6~24.

Japanese Sociological Society Research Committee (JSSRC) . , 1956: Social Mobility in Japan: an Interim Report on the 1955 Surveys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in Japan. Tokyo: Japanese Sociological Society Research Committee.

Japanese Sociological Society Research Committee (JSSRC), 1958: Nihon Shakai noKaiso teki Kozo [Social Structure and Stratification in Japanese Society] .Tokyo: Yuhikaku.

Jones, F. L. , 1969: Social mobility and industrial society: a thesis re-examined, *Sociol. Quar.* 10: pp.292~305.

Jones, F. L. , 1971: Occupational achievement in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 comparative path analysis. *Am. J. Sociol.* 77: pp.527~539.

Jones, F. L. , Davis, P. , 1986: Models of Society: Class, Stratification, and Gender i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Sydney: Croom Helm.

Jöreskog, K. G. , 1970: A general method for the analysis of covariance structures. *Biometrika* 57: pp.239~251.

Kalleberg, A. , 1988: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work structures and inequality, *Ann. Rev. Sociol.* 14: pp.203~25.

Kelley, J. , 1973a: Causal chain models for the socioeconomic career. *Am. Sociol. Rev.* 38: pp.461~295.

Kelley, J. , 1973b: History, causal chains and careers: a reply. *Am. Sociol. Rev.* 38: pp.791~796. See also Featherman, 1973.

Kelley, J. , Klein, H. S. , 1981: Revolution and the Rebirth of In-

equality: a Theory Applied to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in Bolivia. Berkeley: Univ. Calif. Press.

Kerckhoff, A. C. , 1984: The current state of social mobility research. *Sociol. Quar.* 25: pp.139~153.

Kerr, C. et al. , 1960: Industr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Klatzky, S. R. , Hodge, R. W. , 1971: A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occupational mobility. *J. Am. Stat. Assoc.* 66: pp.16~22.

Kraus, V. , Hodge, R. W. , 1990: Promises in the Promised Land: Mobility and Inequality in Israel. Westport, CT: Greenwood..

Krymkowski, D. H. , 1988: Measurement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rocess of stratification. *Social Sci. Rsrch.* 17: pp.191~205.

Kurz, K. , Müller, W. , . 1987: Class mobility in the industrial world. *Ann. Rev. Sociol.* 13: pp.417~442

Laumann, E. O. , Guttman, L. , 1966: The relative associational contiguity of occupations in an urban setting. *Am. Sociol. Rev.* 31: pp.169~178.

Lenski, G. E. , 1966: Power and Privilege: a Theor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Lipset, S. M. , 1960: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New York: Doubleday.

Lipset, S. M. , Bendix, R. , 1959: Soci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 Society, Berkeley: Univ. Calif. Press.

Lipset, S. M. , Zetterberg, H. L. , 1956: A theory of social mobility. *Trans. Third World Cong. Sociol.* Vol. 2. , pp.155~177.

Logan, J. A. , 1983: A multivariate model for mobility tables. *Am. J. Sociol.* 89: pp.324~349.

Luijckx, R. , Ganzeboom, H. B. G. , 1989: Intergenerational class mobility in the Netherlands between 1970 and 1985. In *Similar or Different? Continuities in Dutch Research o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ed. W. Jansen, J. Dronkers, K. Verrips, 5~30. Amsterdam: SISWO.

Lüttinger, P. , K? nig, W. , 1988: Die Entwicklung einer international

vergleichbaren Klassifikation für Bildungssysteme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ternationally comparable educational classification] . *Zuma - Nachrichten* 22: pp.1~14.

Machonin, P., 1969: Ceskoslovenská Spolecnost: Sociologická Analýza Sociální Stratifikace [Czechoslovak Society: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 Bratislava: Epocha .

Machonin, P., 1970: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ontemporary Czechoslovakia. *Am. J. Sociol.* 75: pp.725~741.

Mare, R. D., 1981: Change and stability in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Am. Sociol. Rev.* 46: pp.72~87.

Marsh, R. M., 1963: Values, demand, and social mobility. *Am. Sociol. Rev.* 28: pp.565~575.

Massagli, M. P., Hauser, R. M., 1983: Response variability in self and proxy reports of paternal and filial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Am. J. Sociol.* 89: pp.420~431.

Matras, J., 1980: Comparative social mobility. *Ann. Rev. Sociol.* 6: pp.401~31.

Mayer, K. U., 1979: Class forma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In *Cross-national and Cross-cultural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ed. R. Geyer, 37~56. Oxford: Pergamon.

McClendon, M. J., 1980: Structural and exchange components of occupational mobility: a cross national analysis. *Sociol. Quar.* 21: pp.493~509.

Miller, S. M., 1960: Comparative social mobility. *Current Sociol.* 9: pp.1~89.

Müller, W., Karle, W., K? nig, W, Lüttinger, P., 1988: Education and Class Mobility. CASMIN Working Paper 14.

Niemi, R. G., LeDuc, L., de Guchteneire, P., 1985: A compendium of academic survey studies of elections around the world. *Electoral Studies* 4: pp.159~174.

Odaka, K., Nishihira, S., 1966: 1965 SSM Chosa Tanjun Syukei - hyo. [A Report on the 1965 SSM Survey] . Tokyo: Tokyo University

(mimeo.) .

Parsons, T., 1940: An analytic approach to the theory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Am. J. Sociol.* 45: pp.841~862

Payne, G., 1987: *Mobil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Society*. Basingstoke: MacMillan.

Perrin, E., 1904: On the contingency between occupation in the case of fathers and sons. *Biometrika* 3: pp.467~469.

Portocarero, L., 1983a: Social fluidity in France and Sweden, *Acta Sociologica* 26: pp.127~139.

Portocarero, L., 1983b: Social mobility in industrial nations: women in France and Sweden. *Sociol. Rev.* 31: pp.56~82.

Raftery, A. E., 1985: Social mobility measures for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s. *Quality & Quantity* 19: pp.167~182.

Robert, P., 1984: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to social mobility. In *Stratification and Inequality*, eds. R. Andorka & T. Kolosi. Budapest: Institute for Social Sciences.

Robinson, R. V., Garnier, M., 1985: Class reproduction among men and women in France: reproduction theory on its home ground. *Am. J. Sociol.* 91: pp.250~280.

Rogoff, N., 1979 [1953]: *Recent Trends in Occupational Mobility*, New York: Arno Press [Glencoe: Free Press] .

Rokkan, S., 1951: The work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nt. Social Sci. Bull.* 3: pp.851~856.

Roos, P. A., 1985: *Gender and Work: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ndustrial Societies*. Albany: SUNY Press .

Safar, Z., 1971: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the measurement of soci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 Czechoslovak Socialist Society. *Quality & Quantity* 5: pp.179~208.

Semyonov, M., Roberts, C. W., 1989: Ascription and achievement: trends in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84. *Rsrch. Social Strat. & Mob.* 8: pp.107~128.

Sewell, W. H., Hauser, R. M., 1975: *Education, Occupation, and*

Earnings: Achievement in the Early Career. New York: Academic.

Shavit, Y., Blossfeld, H. - P., 1991: Change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Westview Press [forthcoming]

Shavit, Y., Kraus, V., 1990: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in Israel: a test of the industrialism and credentialism hypotheses. *Sociol. Educ.* 63: pp.133~141.

Simkus, A., 1981: Comparative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Int. J. Comparative Sociol.* 22: pp.213~236

Smith, H. L., Cheung, P. P. L., 1986: Trends in the effects of family background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Philippines. *Am. J. Sociol.* 91: pp.1387~1408.

Sobel, M. E., 1981: Diagonal mobility models: a substantively motivated class of design for the analysis of mobility effects. *Am. Sociol. Rev.* 46: pp.893~906.

Sobel, M. E., 1985: Social mobility and fertility revisited: some new models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mobility effects hypothesis. *Am. Sociol. Rev.* 50: pp.699~712.

Sörensen, A. B., 1986: Theory and methodology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The Sociology of Structure and Action*, ed. U. Himmelstrand, pp.69~95. London: Sage.

Sörensen, A. B., Blossfeld, H. - P., 1989: Socioeconomic opportunities in Germany in the post - War period, *Rsrch. Social Strat. & Mob.* 8: pp.85~106.

Sorokin, P., 1959 [1927]: *Social and Cultural Mobility* Glencoe: Free Press [New York: Harper]

Stanworth, M., 1984: Women and class analysis: a reply to John Goldthorpe. *Sociology* 18: pp.159~170

Svalastoga, K., 1959: *Prestige, Class and Mobility*. Copenhagen: Gyldendal.

Svalastoga, K., 1965: Social mobility: the Western European model, *Acta Sociologica* 9: pp.175~182

Svalastoga, K., H? gh, E., Pedersen, M., Schild, E., 1956: Dif-

ferential class behavior in Denmark. *Am. Sociol. Rev.* 21: pp.435~439.

Taubman, P. ed., 1977: *Kinometrics: Determinants of Socioeconomic Success Within and Between families*. Amsterdam: North - Holland.

Thelot, C., 1982: *Tel Père, Tel Fils [Like Father, Like Son]*. Paris: Dumond.

Tominaga, K. ed., 1979: *Nihon no Kaisokozo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Structure of Japan]*. Tokyo: Tokyo Univ. Press.

Treiman, D. J., 1970: Industrialization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for the 1970s*, ed. E. Laumann, 207~234. Indianapolis: Bobbs - Merrill.

Treiman, D. J., 1977: *Occupational Prestig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Academic.

Treiman, D. J., Ganzeboom, H. B. G., 1990: Comparative status attainment research. *Rsrch Social Strat. & Mob.* 9: pp.105~127.

Treiman, D. J., Yip, K. B., 1989: 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in 21 countries. In *Cross - National Research in Sociology*, ed. M. L. Kohn, pp.373~394. Newbury Park: Sage.

Tuma, N. B., Hannan, M. T., 1984: *Social Dynamics: Models and Methods*. Orlando: Academic.

Tumin, M. M., Feldman, A. S., 1961: *Social Class and Social Change in Puerto Rico*.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Press.

Tyree, A., 1973: Mobility ratios and association in mobility tables. *Pop. Studies* 27: pp.577~588

Tyree, A., Semyonov, M., Hodge, R. W., 1979: Gaps and glissandos: Ine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mobility in 24 countries. *Am. Sociol. Rev.* 44: pp.410~424.

Ultee, W. C., Luijkx, R., 1990: Educational heterogamy and father-to-son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23 industrial nations: general societal openness or compensatory strategies of reproduction? *Eur. Sociol. Rev.* 6: pp.1~25.

Van Tulder, J. M. M., 1962: *De beroepsmobiliteit in Nederland van 1919 tot 1954. Een sociaal - statistische studie*.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the

Netherlands from 1919 to 1954: a Social - Statistical Study] .Leiden: Stenfert - Kroese.

Wesolowski, W., Slomczynski, K., 1968: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lish cities.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ed. J. Jackson, pp.175~21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Winship, C., Mare, R.D., 1983: Structural equations and path analysis for discrete data. *Am. J. Sociol.* 89: pp.54~110.

Wong, R. S. - K., 1990: Understanding cross - national variation in occupational mobility. *Am. Sociol. Rev.* 55: pp.560~573.

Yamaguchi, K., 1983: The structure of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generality and specificity in resources, channels, and barriers. *Am. J. Sociol.* 88: pp.718~745.

Yamaguchi, K., 1987: Models for comparing mobility tables: toward parsimony and substance. *Am. Sociol. Rev.* 52: pp.482~494.

城市社会学的学科建设

为推进社会学的学科和学术建设,促使社会学有能力直面城市化这一当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重大实践课题,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将“城市社会学”设立为自己主要发展的分支学科之一,以李强教授为该方向的学术带头人。与国内传统的城市社会学学科建设略有区别的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利用本校优势,在建筑学院的大力支持下,将该学科建设为交叉学科。凡选择攻读城市社会学学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除修读通常的社会学课程外,还必须修读5门以上的建筑学院课程,包括城市设计和规划原理、城市史等课程,力求使学生的知识结构按照宽基础、综合性的方向发展。此外,还鼓励社会学攻读城市社会学的研究生同建筑学院的研究生开展广泛互动,共同参加研究项目,以求在知识方面取长补短。目前,社会学系与建筑学院“人居环境研究所”共同承担的“北京旧城区改造研究”课题,为实施此种交叉学科合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实验室。

贝弗里奇与“中间道路” 福利理论综介

刘继同*

内容提要:贝弗里奇是世界闻名的“福利国家之父”,以他为代表的“中间道路”不仅是影响深远的思想理论流派,而且其许多理论与思想已成为欧美国家政府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指导原则,对当代欧美国家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实践具有直接和决定性的影响。今年恰逢《贝弗里奇报告》发表60周年。本文主要从贝弗里奇与中间道路的关系、中间道路理论渊源、代表人物、国家角色、市场作用、社会的观念及其对福利国家态度等层面,全面介绍中间道路的福利理论,以期为中国社会福利事业发展提供理论营养与启示。

一 贝弗里奇与中间道路的关系

英国著名学者威廉·贝弗里奇 (William Beveridge,

* 刘继同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研究员。